基本心理需要与农民工非制度化维权意愿

朱平利

（湖北工业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8）

摘 要： 基于积极心理学视角，构建了基本心理需要对农民工非制度化维权意愿的影响机制模型，并运用调查数据进行验证。研究发现，基本心理需要满足能够降低农民工非制度化维权意愿，相对剥夺感在基本心理需要满足与非制度化维权意愿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抗伤害信念在相对剥夺感与非制度化维权意愿之间的调节作用显著。对农民工非制度化维权行为的防控，可以从工作设计与组织情境管理入手，提高农民工基本心理需要满足感，降低其相对剥夺感，从而降低其参与非制度化抗争意愿。

关键词： 农民工；非制度化维权；剥夺感；心理伤害

中图分类号： F32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202(2018)01－0047－12

一、农民工非制度化维权研究综述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6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6 年我国农民工总量约为 2.8 亿，他们已经成为我国城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进城，为国家经济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但他们的正当劳动权益受到侵害的状况较为普遍，由此而衍生的各类非制度化维权行为也时有发生，影响到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1]。在社会经济转型期，农民工非制度化维权的利益表达方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更快更容易实现其目标，但它也容易激发社会不同群体间的矛盾，影响社会的安全稳定[2]，农民工非制度化维权行为已经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

当前，学界对农民工非制度化维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关于农民工非制度化维权的行为逻辑分析，形成了效用收益论、主动维权意识论、新的阶级论和怨恨引发论。潘光辉，赵小仕引入效用理论模型，分析认为农民工维权行为是在当前维权环境下理性选择的结果，在高维权成本的环境下，稳健的维权带来的收益较小，而过激的维权行为能够引起政府及媒介的干预，从而获得更高的成功率和回报率[3]。学者郑卫东则认为，农民工维权意识会持续上升，文化程度、法律知识、工作职位等维权能力影响着农民工维权意愿[4]。新的阶级形成论主要是境外学者的观点，他们认为农民工运动的出现，体现新的阶层意识的觉醒，是对其自身所处地位长期不满的爆发，农民工代表着新的力量与资方进行交涉[5]。还有学者认为由相对剥夺感所引发的怨恨是农民工维权的核心动力，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虽然农民工的经济地位得到提高，但户籍限制使得其在社会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相对剥夺感增加，怨恨情绪随之而来[6]。

二是农民工非制度化维权的意愿影响因素分析。学者们探讨了人口统计学变量、归属感、权益保障水平、社会网络、政治信任、企业制度等因素对农民工非制度化的影响。如蔡禾分析了个人特征如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是否为管理职务影响着农民工非制度化维权意愿，而性别、年龄和

收稿日期： 2017－09－13　　**DOI：** 10.7671/j.issn.1672－0202.2018.01.006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160307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YJC630219)

作者简介： 朱平利(1979－)，男，湖北广水人，湖北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民工问题研究、人力资源管理。E－mail：zpl1110@126.com

收入对非制度化维权意愿并无显著影响,社会网络、政治信任和企业制度等都对农民工非制度化维权意愿有着显著影响[7]。而徐增阳,姬生翔认为,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中,农民工年龄与收入对非制度化维权有着显著影响,剥夺感、经济收入对农民工非制度化维权意愿呈正向显著影响,行业特征也是影响农民工非制度化维权的重要变量[8],郑广怀则认为个人资历和法律政策信息了解程序影响着农民工非制度化维权意愿[9]。

三是农民工非制度化维权的组织与动员研究。研究认为人际关系网络与认同感是农民工非制度化维权动员与组织的基础。农民工所处的人际关系网络对非制度化维权的组织与动员也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冯建华等通过研究发现,农民工参与劳资群体性事件是以熟人为基础形成的网络,与自己的人际网络呈正相关[10],农民工非制度化维权之所以发生,与农民工的人际关系网络有关,使得这一群体的凝聚力较强[11]。农民工群体,面对着相同的社会环境和制度,经历着类似的管理方式,也让他们对自己群体有着强烈的认同感,也是他们形成命运共同体的基础[12]。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新媒体如手机社交软件也在农民工组织与动员的过程中发挥中重要作用[13]。使用新媒体发布、传递信息,能够打破由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所带来的信息传递障碍,也破除了资方对农民工"原子式"管理方式的阻碍,及时地分享和传递有关事情发展的状态,是原有动员与组织方式的重要补充[14]。

四是农民工非制度化维权的抗争策略研究。这方面代表性的研究有"以势维权"、"机会主义的制造麻烦"和"媒体化抗争"策略等理论。于建嵘认为农民抗争具有主动性、组织性特点,农民工大都经历了从以法维权到街头抗议这一过程[15]。李琪提出了农民工"以势维权"的策略,现实中,农民工感觉到自我利益实现的体制内障碍,如工会不能完全代表自己的利益,在法律制度内找不出充分的法律根据时,他们便有"以势维权"的策略,即聚集一定规模的参与者。当认为在组织规模和数量上达到了能够与资方抗争的规模时,以此为"势",提出符合自己期望的甚至超出法律规定的要求,甚至有些企业根本没有违法就已经被动的陷入劳资纠纷之中[16]。陈曦提出了"机会主义的制造麻烦"策略,他认为农民工在斗争中并不是一味地服从资方的意愿,而是抓住一些机会,为管理方制造一些麻烦,让其在政府及广大媒体前变得更加被动[17]。陈天祥等认为,随着网络化技术的发展,农民工会利用媒体来制造有新闻价值的事实,从而吸引传媒关注,进而推动利益诉求[18]。

前期学者对农民工非制度化维权的研究,从非制度化维权的行为逻辑、影响因素、组织与动员、抗争策略都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为后期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这些研究还未能完全揭示个体参与非制度化维权行为的心理机制。心理学研究告诉我们,个体是为需求满足目标的实现进行行为选择。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个人期望与实际满足的差距,产生了"相对剥夺感",这是人们参与社会运动的根源[19]。积极心理学家 Deci 认为,每个人都有自主、胜任和关系三种基本心理需要,满足三种基本心理需要能够提高个体的幸福感[20],相对剥夺感从而也会降低。农民工参与非制度化维权也与个人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程度相关。基于此,本研究将从积极心理学视角建立研究模型,来探讨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度提高是否能降低农民工相对剥夺感,是否能降低农民工参与非制度化维权行为的意愿。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可以从微观领域探讨满足农民工基本心理需要,改进农民工的工作设计与管理方式,降低农民工非制度化维权意愿的偏好,从而促进企业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

二、基本心理需要与农民工非制度化维权意愿研究假设

(一)基本心理需要对农民工非制度化维权意愿的影响

19 世纪,英国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从人的需求角度来解释人的行为产生的原因。农民工参与

非制度化维权也能从其需求中找到其决定的因素。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积极心理学家 Deci Edward L 和 Ryan Richard M 等人提出了自我决定理论,认为每个个体先天固有和普遍存在着三种基本心理需要(自主需要、关系需要和胜任需要),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对人们的自我发展和积极行为具有重要作用。自主需要是指个体对行为具有选择,遵循个人意愿的内在渴望,希望在行为中感受心理上的自由,同时希望在工作中感到不受限制,对自我的行为和决策拥有选择的权力;关系需要是指个体具有内在希望与他人建立联系,成为组织成员的意愿,在与周围人接触的过程中感受到被关爱的需求;胜任需求是指个体希望在工作中感受到对环境和工作结果的掌控[20]。在实际研究中,自我决定理论所强调的三种需要并不是指个体自身需求的强度,而是指特定环境对三种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程度。当个体所处的社会环境能满足基本心理需要时,个体能够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社会,体会到幸福感与存在的意义。Milyavskaya 的研究表明,提高个体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能够提高个体的幸福感,降低个体的相对剥夺感,从而让个体产生积极的心态与行为[21]。追求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同样是农民工个体行为意愿动力的源泉,因此,本研究假设 1:基本心理需要对农民工非制度化维权意愿有负向影响,即农民工基本心理需满足程度越高,其非制度化维权意愿越低。

假设 1a:自主需要对农民工非制度化维权意愿有负向影响。

假设 1b:关系需要对农民工非制度化维权意愿有负向影响。

假设 1c:胜任需要对农民工非制度化维权意愿有负向影响。

(二)相对剥夺感对基本心理需要与农民工非制度化维权意愿关系的调节作用

相对剥夺感是指人们从期望得到的和实际得到的差距以及与其相应的参照群体比较过程中产生出的一种负面的主观感受[22]。马克思认为,统治阶级凭借其所占有的资源对被统治阶级进行剥夺,随着被统治阶级能感知到的剥夺不断增强,其针对统治阶级的反抗将集体性地组织起来,可见,剥夺感会导致非制度化集体抗争[23]。斯梅尔塞的“价值累加理论”也说明,当人们实际遇到或感觉到权益或机会被剥夺时会产生不满情绪、怨恨等心理,这些社会心理因素将促使行动参与者做出一些非理性行为[24]。相对剥夺感是人们参与非制度化维权的核心动力机制之一,可以作为预测非制度化维权行为的有效变量[25-26]。国外学者也作了一些实验验证,如 Tougas 等运用实验方法进行研究发现,人们参与非制度化维权意愿受到不公平感、相对剥夺感的影响,人们对不公平的感知并不能直接导致群体性事件,而相对剥夺感是引起非制度化维权的直接变量[27]。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农民工没能享受到医疗、住房、教育、福利和城市的其他服务,如今由于工资问题、工作条件、管理问题等造成的劳资纠纷依然存在,他们工作的环境相对较差,缺乏相应的社会保障,工作时间普遍超时;同时,收入差异加大,社会现实与其期望还有较大差距,他们易于产生相对剥夺感[28]。在转型期,社会地位低、经济收入较低的农民工群体,需要得不到满足,相对剥夺感强,这种相对剥夺感达到一定的程度时,会引起他们对社会的强烈不满,也影响着社会的稳定。Deci 和 Ryan 以一家投资银行公司的工作人员为样本进行研究,调查发现当员工的自主需要、胜任需要和关系需要的满足度得到提高时,员工工作幸福感提高,相对剥夺感降低,工作效率明显得到提高[29]。Talaska 等的研究印证:负面情绪可以作为消极行为直接预测变量。相对剥夺感作为一种负面性的心理体验,如果不能从正常的途径宣泄出来,随着积累的时间增加,当其超过个体所承受的心理范围时,就导致一些消极破坏行为,甚至群体行动[30]。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2:相对剥夺感在基本心理需要与农民工非制度化维权意愿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假设 2a:相对剥夺感在自主需要与农民工非制度化维权意愿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假设2b:相对剥夺感在关系需要与农民工非制度化维权意愿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假设2c:相对剥夺感在胜任需要与农民工非制度化维权意愿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三)抗伤害信念对相对剥夺感与农民工非制度化维权意愿的调节作用

抗伤害信念指个体对所属群体具有能够应对各种困难和威胁能力的信念[31]。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成员尽管绝大多数伴随着愤怒、不满及沮丧等消极情绪,但只有小部分参与到群体性事件中去,大多数仍然会选择沉默和忍受[32]。当群体中的成员认为其所属群体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能够应对一系列问题时,参与非制度化维权意愿会更强[33]。学者 Bettencourt 等引入抗伤害信念来研究极端群体性事件的产生机制。在研究中他们发现,如果隶属于某个群体的成员认为其所属群体的抗伤害能力较差,他们对自己牺牲所产生的意义是不够自信的,因此不太愿意参与到极端群体事件中去;反之,参与意愿则要强烈得多[34]。2008 年,我国颁布了《劳动合同法》,进一步为农民工的经济权益提供了法律保证。2008 年之后,农民工非制度化抗争事件出现井喷,反映出农民工的维权意识逐渐增强,加上大量的媒体报道宣传,也增强了农民工群体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信心。当然,在具体案例中,农民工维权失败的事件也时有发生,还有相当一部分工人的集体维权受到了压制。对参与非制度化抗争的农民工来说,他们经济承受能力相对较弱,抵制风险的能力也较差,当社会矛盾激化时,往往要付出比较大的代价(如被辞退,甚至受到人身威胁)。因此,参加非制度化抗争行为需要一定的抗伤害信念。据此,本研究假设3:抗伤害信念调节相对剥夺感对农民工非制度化维权意愿的影响。

综合以上研究假设所包含各变量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得到的研究模型如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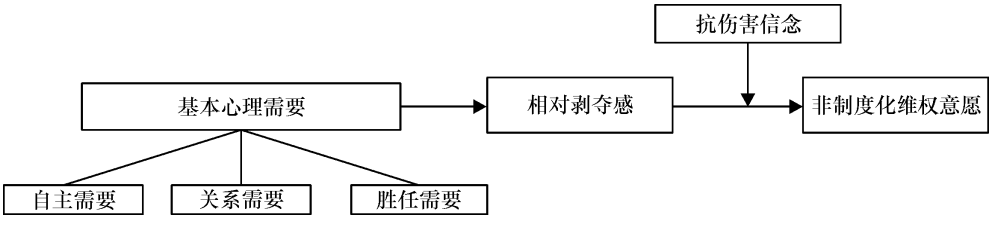


图1 本研究理论模型

三、研究数据获取、变量测量与模型设定

(一)研究数据调查

课题组主要选取假期返回农村大学生为调查员进行调查,以保证其所收集样本为农民工,本次调查共发放正式问卷600份,实际回收问卷523份,剔除其中的无效问卷后,最终得到有效问卷376份,有效回收率为62.6%。在对回收的问卷进行审查的过程中,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把其当作无效问卷:(1)答案空缺题在2项以上;(2)同时选择两个以上答案;(3)选择不确定或者回答居中的选项超过题项数的一半;(4)回答有明显矛盾的地方。

运用SPSS 20.0统计软件对整理后376份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包括性别、文化程度、年龄和婚姻状况等,得到正式使用样本的人口统计学分布基本情况详见表1。

(二)变量测量

(1)非制度化维权意愿。本研究采用学者徐增阳,姬生翔开发的量表进行测量[8]。该量表主要包括6个子项目,用以测量农民工对维权倾向方式的选择强度意愿,主要包括有自残自杀威胁、堵马路、游行示威、罢工、打砸、找黑社会等六种方式来维护个人权益来进行测量农民工非制度化维权意愿。问卷中的问题有六个:"当您的权益受到侵犯时,你是否愿意采用自残自杀威胁的方式

解决,”“是否愿意采用堵马路的方式解决”等作为题项,来测量其意愿强烈程度,运用 Liket 五分量表来进行量化,分别代表意愿强弱。本研究中量的克朗巴赫 α 信度系数达到 0.934。

表 1　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　　(N = 376)

项目	选项	频数	占比	项目	选项	频数	占比
性别	男	143	38%	婚姻状况	未婚	109	29.0%
	女	233	62%		已婚	267	71.0%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277	73.7%	年龄	30 岁以下	136	36.2%
	高中或中专	92	24.5%		30 ~ 40 岁	162	43.1%
	大专及以上	7	1.9%		40 ~ 50 岁	59	15.7%
					50 岁以上	19	5.1%

(2)相对剥夺感。在对相对剥夺感的测量上,有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两种方式:横向是与自己条件相似的群体或者他人进行比较的结果,纵向是与自己的历史或者期望进行比较。在衡量的方式上,一般以个体对自己收入的感受为基础来构建相对剥夺感的测量指标。本研究采用李汉林老师的个体相对剥夺感问卷[35],使用的相对剥夺感问题项有 6 个,运用 Liket 五分量表来进行量化,分别代表相对剥夺感的强弱。本研究中相对剥夺感量表的克朗巴赫 α 信度系数达到了 0.931。

(3)抗伤害信念。本研究采用学者石晶,郝振,崔丽娟开发的抗伤害信念量表[31],该量表包括“面对困难时,我确信我的群体和我都能幸存下来”、“我不像我群体里的一般人那么脆弱”等 6 个题项,采用运用 Liket 五分量表来进行计分,分别代表抗伤害信念的强弱,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信度系数达到 0.876。

(4)基本心理需要。本研究采用 Deci 和 Ryan 编制的相应的量表,有 21 个题项[36]。学者刘惠军等在对基本心理需要与职业倦怠的关系研究中,使用了由 Deci 和 Ryan 编制的量表,在他们的研究中,基本心理需要量表的信度系数为 0.84,表明此量表对我国员工测量有一定的适用性[37]。在本次调查中,自主需要、关系需要和胜任需要三个量表的克朗巴赫 α 信度系数分别为 0.875、0.812 和 0.838,基本心理需要总量表克朗巴赫 α 信度系数为 0.811。

(5)控制变量。本研究中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男性量化为 1,女性量化为 2;年龄,30 岁以下定义为 1,30 ~ 40 岁以下定义为 2,40 ~ 50 岁以下定义为 3,50 岁以上定义为 4;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定义为 1,高中定义为 2,大专及以上定义为 3;婚姻状况,未婚定义为 1,已婚定义为 2。

(三)模型设定

本研究将采用温忠麟等人提出的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的分析方法来检验本研究中假设[38]。为检验相对剥夺感变量对基本心理需要与非制度化维权意愿的中介作用。本研究构建模型 A1:$Y_1 = a_1 + \sum_{i=0}^{4} b_i X_i + b_{11} X_{11} + e_1$;模型 A2:$M_1 = a_2 + \sum_{i=0}^{4} b_i X_i + a_{11} X_{11} + e_2$ 和模型 A3:$Y_1 = a_3 + \sum_{i=0}^{4} b_i X_i + c'_1 X_{11} + b'M_1 + e_3$。其中,$Y_1$ 为因变量农民工非制度化维权意愿,X_i(i = 1,2,3,4)为控制变量,X_{11}为自变量基本心理需要,M_1 为中介变量相对剥夺感。依据同样的方式,建立模型 A4、A5 等来验证相对剥夺感对基本心理需要各子维度(自主需要、关系需要和胜任需要)与非制度化维权意愿的中介作用,运算结果见下表 4。

基于调节变量的检验模型,为检验抗伤害信念的调节作用,本研究建立的模型 B1:$Y_1 = a_4 + \sum_{i=0}^{4} b_i X_i + a_{11} X_{12} + bM_2 + e_4$;模型 B2:$Y_1 = a_4 + \sum_{i=0}^{4} b_i X_i + a_{11} X_{12} + bM_2 + c'_2 X_{12} M_2 + e_5$。其中,$Y_1$ 为因变量农民工非制度化维权意愿,X_i(i = 1,2,3,4)为控制变量,X_{12}为自变量相对剥夺感,M_2 为调节变量抗伤害信念,运算结果见表 6。

四、基本心理需要对非制度化维权意愿的影响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信度与相关分析

运用 SPSS 19.0 进行各研究变量描述性统计、信度及相关分析，变量基本心理需要及各维度、相对剥夺感、抗伤害信念和非制度化维权意愿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所测样本在基本心理需要、自主需要满足程度的体验度不高，相对来说，所测样本在关系需要、胜任需要、相对剥夺感、抗伤害信念和非制度化维权意愿维度上评价较高；表明农民工在工作自主性方面受到限制，能够体会到社会的不公平感。研究量表的信度系数都在0.8以上，说明本研究量表数据的可靠性高。在各研究变量的关系上，基本心理需要满足与相对剥夺感、抗伤害信念和非制度化维权意愿呈显著负相关；自主需要与相对剥夺感、抗伤害信念和非制度化维权意愿呈显著负相关；而关系需要与相对剥夺感、抗伤害信念和非制度化维权意愿之间的变量相关关系不显著；胜任需要与相对剥夺感、抗伤害信念和非制度化维权意愿呈显著负相关；相对剥夺感与非制度化维权意愿呈显著正相关；后面将在中介效应用调节效应中作进一步分析。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信度及相关性分析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信度	1	2	3	4	5	6
1. 基本心理需要	2.943	0.439	0.811						
2. 自主需要	2.483	0.714	0.876	0.732**					
3. 关系需要	3.329	0.738	0.812	0.546**	0.058				
4. 胜任需要	3.017	0.642	0.838	0.612**	0.326**	−0.092			
5. 相对剥夺感	3.816	0.926	0.931	−0.266**	−0.338**	0.059	−0.241**		
6. 抗伤害信念	3.262	0.61	0.876	−0.267**	−0.17**	−0.021	−0.335**	0.478**	
7. 非制度化维权意愿	3.369	0.755	0.934	−0.291**	−0.347**	0.071	−0.294**	0.489**	0.267**

注： ** 表示 $p<0.01$，* 表示 $p<0.05$（双测检验）显著。

（二）各研究量表的区分效度及同源性偏差分析

对研究的各量表进一步作验证性因素分析，以检验各研究量表的区分效度，对基本心理需要、相对剥夺感、抗伤害信念、非制度化维权意愿四个潜变量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如表3所示，比较各模型的拟合指标，可以发现四因素模型的各项指标都优于其他模型，且其 RMSEA 值为0.057，小于0.08。χ^2/df 的值接近于2，GFI、CFI 和 AGFI 的值都大于0.85，都达到了相应的判断标准，证明这四个量表有良好的区分效度。对所有变量进行 Harman 单因子检验，作探索性因子分析，析出的第一个因子解释变量差异为29.09%，小于临界值，说明在本研究中无同源性偏差不显著。

表3 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拟合结果

模型	χ^2/df	GFI	CFI	AGFI	RMSEA
四因素模型（基本心理需要、相对剥夺感、抗伤害信念、非制度化维权意愿）	2.224	0.905	0.964	0.88	0.057
三因素模型（基本心理需要、相对剥夺感、抗伤害信念 + 非制度化维权意愿）	9.744	0.563	0.743	0.453	0.153
二因素模型（基本心理需要 + 相对剥夺感、抗伤害信念 + 非制度化维权意愿）	10	0.555	0.73	0.453	0.156
单因素模型（基本心理需要 + 相对剥夺感 + 抗伤害信念 + 非制度化维权意愿）	18.187	0.376	0.486	0.238	0.214

(三)基本心理需要对非制度化维权意愿的影响检验及解释

基本心理需要及其子维度与非制度化维权意愿的主效应检验结果见表 4。模型 A1 分析结果表明,在控制了性别、受教育程度等变量后,基本心理需要对非制度化维权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原假设 1 得到了验证。按照基本心理需要理论的观点[20],追求基本心理需要满足也是农民工固有的需要,由于农民工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受到阻碍,农民工会寻找需要满足的补偿行为,以让其获得心理需要的暂时满足,非制度维权行为便是行为方式之一。这与 Vansteenkiste 等的观点一致,即个体基本心理需要没有得到满足时,会寻找替代行为,甚至会出现一些负面行动[39]。进一步通过模型 A4、A7 和 A8 分析发现,在控制了性别、受教育程度等变量后,自主需要、胜任需要变量对非制度化维权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关系需要变量对非制度化维权意愿呈正向影响,原假设 1a、1c 得到了验证,而假设 1b 未能得到了验证。研究结果体现了基本心理需要各子维度对非制度化维权意愿的影响差异,其中自主需要的影响系数 β 为 -0.366,胜任需要的影响系数 β 为 -0.358,而关系需要的影响系数 β 为 0.073。自主需要和胜任需要主要体现为个体对工作过程与结果的自我控制程度,由于农民工群体自身人力资本较弱[40],所从事工作的性质决定其对工作岗位自主性和胜任性的体验程度不高,这两种需要受阻导致农民工非制度化维权行为意愿增加,研究结果与学者 Vansteenkiste, Mouratidis 和 Lens 的研究一致,自主需要和胜任需要动机的取向会导致个体产生消极后果[41]。关系需要则体现为农民工群体的归属、与他人的关联需要,农民工个体与他人关联程度高,表明个体群体归属感强,有研究证实群体归属感对集体行动的有着显著正向影响[25],因此,本研究数据中农民工关系需要满足度与非制度化维权行为意愿呈现正向影响。

(四)相对剥夺感的中介效应检验及解释

在本研究中,基本心理需要包含三个子维度,所以,相对剥夺感的中介效应检验,也是从整体到部分来进行检验,即检验相对剥夺感对基本心理需要及其各维度与非制度化维权意愿中介效应,建立模型的分析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主效应及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结果

变量	非制度化维权意愿	相对剥夺感	非制度化维权意愿	非制度化维权意愿	相对剥夺感	非制度化维权意愿	非制度化维权意愿	非制度化维权意愿	相对剥夺感	非制度化维权意愿
	模型 A1	模型 A2	模型 A3	模型 A4	模型 A5	模型 A6	模型 A7	模型 A8	模型 A9	模型 A10
控制变量										
性别	-0.101	0.156*	-0.157*	-0.08	0.183*	-0.143*	-0.125	-0.144*	0.11	-0.184*
文化程度	0.106	-0.037	0.119*	0.123	-0.017	0.128*	0.114	0.101	-0.04	0.116*
婚姻状况	0.014	0.153	-0.041	0.008	0.145	-0.042	0.008	-0.012	0.127	-0.058
年龄	-0.136*	-0.241*	-0.049	-0.125*	-0.229**	-0.046	-0.117*	-0.127*	-0.230**	-0.044
自变量										
基本心理需要	-0.507**	-0.593**	-0.293**							
自主需要				-0.366**	-0.450**	-0.212**				
关系需要							0.073			
胜任需要								-0.358**	-0.348**	-0.232**
相对剥夺感			0.361**			0.343**				0.362**
R^2	0.118	0.122	0.29	0.15	0.163	0.298	0.036	0.123	0.101	0.3
adjR^2	0.106	0.11	0.279	0.139	0.152	0.287	0.023	0.111	0.089	0.288
F 值	9.882	10.29	25.132	13.063	14.395	26.146	2.759	10.387	8.333	26.339

注: ** 表示 $p<0.01$, * 表示 $p<0.05$(双测检验)显著。

首先检验相对剥夺感对基本心理需要满足与非制度化维权意愿的中介效应,按照中介效应的检验步骤,建立模型 A1、A2 和 A3 进行回归分析,比较模型 A1 和模型 A3,基本心理需要的回归系数下降,$\beta = -0.293$,相对剥夺感对非制度化维权意愿的回归系数为 $\beta = 0.361$,在 0.01 的水平上都显著,说明相对剥夺感在基本心理需要满足与非制度化维权意愿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原假设 2 通过了检验。其次分析相对剥夺感对基本心理需要各子维度与非制度化维权意愿的中介效应,对比模型 A4、A5、A6,表明相对剥夺感在自主需要满足与非制度化维权意愿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原假设 2a 通过检验。而依据模型 A7,可以看出,关系需要的回归系数 $\beta = 0.073$,但不显著,不能进一步作中介效应分析,相对剥夺感在关系需要满足与非制度化维权意愿的关系中不起中介作用,原假设 2b 没能通过检验。对比模型 A8、A9、A10 的回归系数,说明相对剥夺感在胜任需要满足与非制度化维权意愿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原假设 2c 通过检验。

进一步地,参照 Preacher 等提出的 Bootstrap 方法检验中介效应[42],分析结果如表 5 所示,可以看出,基本心理需要对非制度化维权意愿的直接效应是 -0.296,间接效应是 -0.203,在 95% 的置信区间上,中介结果检验区间中不包括 0(BootLLCI = -0.295,BootULCI = -0.125)。在基本心理需要的各维度上,自主需要的直接效应是 -0.216,间接效应是 -0.154;关系需要的中介结果检验区间中包括 0,因此其中介效应不显著,胜任需要的直接效应是 -0.221,间接效应是 -0.126。综合以上分析,相对剥夺感中介基本心理需要满足与非制度化维权意愿,主要是通过自主需要满足和胜任需要满足来实现中介效应的。

表 5 基于 Bootstrap 的中介效应分析

自变量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BootSE	BootLLCI	BootULCI
1. 基本心理需要	-0.296**	-0.203	0.043	-0.295	-0.125
2. 自主需要	-0.216**	-0.154	0.025	-0.205	-0.105
3. 关系需要	-0.044	-0.029	0.027	-0.022	0.083
4. 胜任需要	-0.221**	-0.126	0.029	-0.185	-0.073

可以看出,农民工基本心理需要对非制度化维权意愿影响的路径,是通过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缺失所产生的相对剥夺感作为中介而形成的。依照挫折—攻击理论[43],“相对剥夺感”是个体参与群体行动的根源,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每个人都有一种期望,当社会变迁导致社会不能满足其价值期望时,相对剥夺感随之产生,当个体所感知到的相对剥夺感增加时,人们抗争的意愿就越强烈。农民工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程度上的挫折感,主要源于其对基本心理需要满足被剥夺所带来的体验,非制度化维权意愿就会产生。本研究也印证了 Talaska 等的观点[30]。本研究中相对剥夺感对自主与胜任需要的中介关系显著,而对关系需要的中介作用不显著,说明农民工更加关注个体的自主与对工作岗位的胜任。随着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走上工作岗位,他们不仅看重工资待遇水平,也看重工作环境和发展前景,希望能有自主与独立的空间。

(五)抗伤害信念的调节作用的检验及解释

依据前面所设立的调节模型,抗伤害信念在相对剥夺感与非制度化维权意愿之间的调节效应检验的回归分析结果,详见表 6 所示。

模型 B1 以非制度化参与意愿为因变量,以性别等人口统计特征为控制变量,相对剥夺感和抗伤害信念为自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总体看来,模型 B1 反映出相对剥夺感、非制度化参与意愿之间的线性关系显著,该模型解释了因变量参与意愿 25.4% 的变差,待定系数 R^2 为 0.268,把相对剥夺感与抗伤害信念的交互项引入模型 B2 后,因变量相对剥夺感的方差解释的比例由 25.4% 增

加为 31.3%,待定系数 R^2 由 0.268 增加到 0.325,说明交互项的进入增强了对非制度化参与意愿的解释,并且交互项相对剥夺感 × 抗伤害信念在 0.001 水平上显著($\beta = 0.523$, $p < 0.01$),这说明抗伤害信念在相对剥夺感与非制度化维权意愿之间的调节作用显著,假设 3 得到数据验证。研究表明,抗伤害信念可调节相对剥夺感与非制度化维权意愿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讲,农民工的抗伤害信念越强,相对剥夺感对非制度化维权意愿的正向影响越大;农民工的抗伤害信念越弱,相对剥夺感对非制度化维权意愿正向影响越小。近年来,国家越来越关注对农民工权益的保护,针对农民工权益保障的执法力度的加大,这些增强了农民工群体维权的信念。农民工参与非制度化维权需要考虑自身群体的资源和能力,农民工抗伤害信念增强,参与非制度化维权行动的意愿也会增强,研究的结论与 Greene 一致,即个体认为其所在的群体抗伤害能力强,那么,相对剥夺感对参与非制度化维权意愿的影响也会增加[44]。图 2 描绘出了抗伤害信念调节相对剥夺感对非制度化维权意愿影响的趋势。

表 6　调节效应模型检验结果

变量	非制度化维权意愿	
	模型 B1	模型 B2
控制变量		
性别	−0.184**	−0.157*
文化程度	0.125*	0.085
婚姻状况	−0.043	−0.046
年龄	−0.034	−0.032
自变量		
相对剥夺感	0.378**	0.424**
抗伤害信念	0.077	0.208*
相对剥夺感 × 抗伤害信念		0.352**
R^2	0.268	0.325
$adjR^2$	0.254	0.313
F 值	22.33	25.36

注: ** 表示 $p < 0.01$, * 表示 $p < 0.05$(双测检验)显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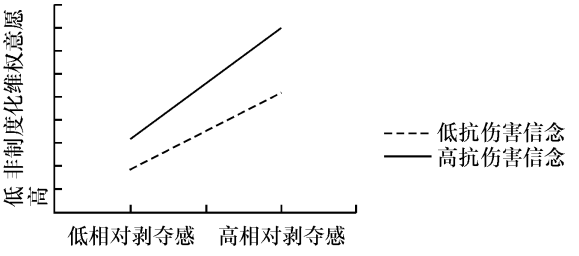


图 2　抗伤害信念的调节效应图

五、农民工基本心理需要满足感的提升

本文从积极心理学的微观视角,提出了基本心理需要对农民工非制度化维权意愿影响机制的研究模型,利用调查的数据,运用回归分析方法检验了相对剥夺感的中介效应和抗伤害信念的调节效应。本研究发现: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程度提高能够降低农民工的非制度化维权意愿。相对剥夺感在基本心理需要与非制度化维权意愿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抗伤害信念在相对剥夺感与

参与意愿之间的调节作用显著。

对于农民工非制度化维权事件,可以从事件的源头抓起,从平时的组织情境管理入手,通过满足农民工基本心理需要,降低其相对剥夺感,从而降低其参与非制度化抗争意愿,让更多的农民工通过理性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以期达到建立起和谐的劳动关系的目的,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提高农民工管理参与度,满足农民工的自主需要和关系需要。农民工劳资群体性事件的参与,与需要没有得到满足相关,组织可以让农民工体验到自主需要和关系需要的满足,从而提高农民工基本心理需要满足感。提高管理者管理水平,减少辱虐式管理对员工的伤害。管理者应当从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出发,充分认识到新生代农民工对自主需要和胜任需要的追求,改变泰勒式的管理方式,在充分尊重新生代农民工需要的基础上,用友情化的管理方式,让员工感受到宽容和爱,从而避免辱虐管理给员工带来不良的影响。

(2)加强对工作结果的反馈与指导,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自主和胜任需要。新生代农民工所从事的工作,技术含量有限,而且在分工理论的指导下,现代化的操作方式,让以往完整的工作被细化为若干单元,简单和重复构成了现代工作的主体。虽然在当前条件上,设计出让农民工能够产生积极心理体验的工作岗位存在着一定的难度,然而,组织可以加强对工作的反馈,在指导上多下功夫,让员工在反馈中得到认可,提高其自我效能感,加强指导,从而提高新生代员工的技能,通过反馈互动,提高新生代员工工作的能力,从而提高其聘任价值,提高农民工自主感和胜任感。

(3)给予农民工真正的市民待遇,提高农民工务工所在地城市归属感。提高农民工务工所在地城市归属感能够提高农民工关系需要的满足,让其感知到社会的关注与温暖,从而避免其在维权过程出现极端行为。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各地政府出台了居住证制度,让外来务工人员享有与当地居民平等的权益,但在具体的操作上还存在着差别,如规定外来人员的购房与社保缴费年限之间挂钩,制度的合理性缺少依据。各地政府应当按照宪法的规定,充分考虑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需要,从制度上避免对其排斥,制订易于操作的制度和规定,保障其作为公民享有的正当权益。

参考文献:

[1]牛静坤, 王晶晶, 张楠. 农民工集群行为参与惯性分析[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7(3):84 - 94.

[2]杨翠萍, 李秋霞. 农民工制度化维权意愿的多维度分析[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15(5):78 - 86.

[3]潘光辉, 赵小仕. 理性、维权环境与农民工过激维权行为[J]. 当代经济管理, 2016, 38(1):42 - 46.

[4]郑卫东. 农民工维权意愿的影响模式研究基于长三角地区的问卷调查[J]. 社会, 2014, 34(1):120 - 147.

[5]CHRIS CHAN. Class struggle in China: case studies of migrant worker strike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J]. South African Review of Sociology, 2010, 41(3) :61 - 70.

[6]王晴锋. 农民工集体行动因素分析[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0, 27(2): 51 - 62.

[7]蔡禾. 从利益诉求的视角看社会管理创新[J]. 社会学研究, 2012(4):10 - 16.

[8]徐增阳, 姬生翔. 农民工非制度化维权倾向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全国 1554 个农民工样本的分析[J]. 中国软科学, 2015(1):67 - 76.

[9]郑广怀. 资历与信息的制约——影响农民工维权的微观因素分析[J]. 清华法律评论, 2007(1):55 - 66.

[10]冯建华, 周林刚. 西方集体行动理论的四种取向[J]. 国外社会科学, 2008 (4): 48 - 53.

[11]孔凡义. 从政治边缘人到集体行动者: 农民工行为的演变逻辑[J]. 科学决策, 2011 (7): 49 - 61.

[12]杨正喜. 结构变迁、怨恨集聚、共同命运与华南地区工人集体行动[J]. 社会科学,2012(7):79 - 88.

[13]汪建华. 互联网动员与代工厂工人集体抗争[J]. 开放时代, 2011(11): 114 - 128.
[14]王侃. 新媒体、微博与中国工人集体行动[J]. 中国工人, 2012 (1): 31 - 32.
[15]于建嵘. 中国农民工的依法维权[J].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2008, 24(6):12 - 18.
[16]李琪. "以势维权":新生代农民工与集体行动[J]. 中国工人, 2013(4):11 - 16.
[17]CHEN F. Trade unions and the quadripartite interactions in strike settlement in China[J]. China Quarterly, 2010, 201(201):104 - 124.
[18]陈天祥, 金娟, 胡三明. "媒介化抗争":一种非制度性维权的解释框架[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13(5):90 - 96.
[19]COOLING B F, HILLIARD J B, GURR T R. Why men rebel [J]. Military Affairs, 1972, 36(1):26.
[20]EDWARD L DECI, RICHARD M RYAN. The "what" and "why" of goal pursuits: human needs and the self - determination of behavior [J]. Psychological Inquiry, 2000, 11(4):227 - 268.
[21]MILYAVSKAYA M, KOESTNER R. Psychological needs, motivation, and well - being: a test of self - determination theory across multiple domains [J]. Personality &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11, 50(3):387 - 391.
[22]熊猛, 叶一舵. 相对剥夺感:概念、测量、影响因素及作用[J]. 心理科学进展, 2016, 24(3):438 - 453.
[23]李斌雄, 赵亚男. 马克思主义劳动原理视阈中腐败的根源、特征和治理路径[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2):12 - 20.
[24]刘勇. 利益差异效能累加:群体冲突的触发根源——以斯梅尔塞的"价值累加理论"为诠释框架[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1):150 - 155.
[25]张书维, 王二平. 群体性事件集群行为的动员与组织机制[J]. 心理科学进展, 2011, 19(12):1730 - 1740.
[26]KOOMEN W, FRÄNKEL E G. Effects of experienced discrimination and different forms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among surinamese, dutch ethnic minority group [J]. Journal of Community &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1992, 2(1):63 - 71.
[27]TOUGAS F, BEATON A M. Personal and group relative deprivation: connecting the "I" to the "w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119 - 135.
[28]王春玲, 付雨鑫. 我国农民工集体行动的网络机理 · 特征与政府治理[J]. 安徽农业科学, 2012, 40(13): 7946 - 7948.
[29]DECI E L, RYAN R M. Self - determination theory: a macro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 development, and health [J]. Canadian Psychology, 2008, 49(3):182 - 185.
[30]TALASKA C A, FISKE S T, CHAIKEN S. Legitimating racial discrimination: emotions, not beliefs, best predict discrimination in a meta - analysis [J]. Social Justice Research, 2008, 21(3):263 - 296.
[31]石晶, 郝振, 崔丽娟. 群体认同对极端群体行为的影响:中介及调节效应的检验[J]. 心理科学, 2012(2):147 - 153.
[32]FRIEDMAN E. Accepting authoritarianism: state - society relations in China's reform era, by teresa wright[J]. 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2011,66(18):413 - 416.
[33]ZOMEREN M V, IYER A.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dynamics of collective action[J].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2009, 65(4):645 - 660.
[34]BETTENCOURT B A, CHARLTON K, DORR N, ET AL. Status differences and in - group bias: a meta - analytic examination of the effects of status stability, status legitimacy, and group permeability [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2001, 127(4):520 - 542.
[35]李汉林, 魏钦恭, 张彦. 社会变迁过程中的结构紧张[J]. 中国社会科学, 2010(2):121 - 143.
[36]DECI E L, RYAN R M, GAGNÉ M, ET AL. Need satisfaction, motivation, and well - being in the work organizations of a former eastern bloc country: a cross - cultural study of self - determination [J].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001, 27(8):930 - 942.
[37]刘惠军, 纪海英, 王英. 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对医生工作倦怠和工作投入的预测作用[J].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 2012, 37(2):93 - 99.
[38]温忠麟, 侯杰泰, 张雷. 调节效应与中介效应的比较和应用[J]. 心理学报, 2005, 37(2):268 - 274.
[39]VANSTEENKISTE M, RYAN R M. On psychological growth and vulnerability: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 satisfaction and need frustration as a unifying principle. [J]. Journal of Psychotherapy Integration, 2013, 23(3):263 - 280.
[40]刘程. 农村劳动力移民的地位分层及认同分化[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6(1):66 - 74.
[41]VANSTEENKISTE M, MOURATIDIS A, LENS W. Detaching reasons from aims: fair play and well - being in soccer as a function of pursuing performance - approach goals for autonomous or controlling reasons [J]. J Sport Exerc Psychol, 2010, 32(2):217 - 242.
[42]PREACHER K J, RUCKER D HAYES A F. Assessing moderated mediation hypotheses: theory, methods, and prescriptions [J]. Multivariate Behavioral Research, 2007, 42(1):185 - 227.
[43]GASKELL G, SMITH P. Relative deprivation in black and white youth: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J].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984, 23 (2):121.
[44]GREENE K, KRCMAR M, WALTERS L H, ET AL. Targeting adolescent risk-taking behaviors: the contributions of egocentrism and sensation-seeking [J]. J Adolesc, 2000, 23(4):439 - 461.

Basic Psychology Needs and Migrant Workers' Acceptance of Non-institutionalized Right Protection

ZHU Ping-l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u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430068,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itive psychology, the paper constructs a model on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the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s on the non-institutionalized right protection of migrant workers, and uses the survey data to verify.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satisfaction of the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s can reduce migrant workers' non-institutionalized rights protection willingness, the sense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between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s and non-institutionalized rights,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anti-injury beliefs between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non-institutionalized rights is significant. To prevent the migrant workers' non-institutionalized rights activism, we can improve the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s of migrant workers and reduce their relative deprivation, thus reducing their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non-institutionalized struggle.

Key Words: migrant workers; non-institutionalized rights; deprivation; menticide